

中国

革命史
现代史

专题报告集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

中国革命史 现代史 专题报告集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
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

一九八六年六月

编 辑 说 明

本书为京、宁、沪等地一些著名史学家于1985年秋应邀在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所办“中国现代史暨革命史讲习班”上作的专题报告集，系根据当前高等院校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之需，并应有关单位的要求而编印。全书内容丰富，观点新颖，史料翔实，信息量大，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它可供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教学与研究参考，对中共党史、中华民国史和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等学科的教研工作亦有很大裨益。

本书共收入17篇专题报告。其中，张同新、曹健民、唐培吉三人的报告为作者自撰的讲稿；丁名楠、姜义华、陈铁健、张宪文、唐宝林五人的报告是经作者亲自修改、补充的录音整理稿；余皆为未经报告人审阅的录音整理稿。各稿除有报告人署名外，凡属录音整理稿，不论是否经报告人本人审阅，文末均有录音整理者署名。

在本书编辑过程中，编者曾对各稿作了一定的技术处理，有的还作了一些删节，并对绝大多数录音整理稿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文字加工、标点分段和核实史料，有的还作了重新整理。因受篇幅所限，收入本书的专题报告篇数比原计划有减少，谨请有关专家和读者鉴谅。

本书是在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领导下，由该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集体汇编的。具体编辑工作由盛祖绳负责，陆伟、许世华、张元隆、赵希葆、周士英、潘纯刚、吴继

目 录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丁守和 (1)
对中国革命史的重新思考·····	姜义华 (41)
中国文化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唐振常 (52)
漫谈中美关系史·····	丁名楠 (79)
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历史上的几个问题·····	邵维正 (91)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几个问题·····	杨云若 (118)
关于瞿秋白问题的研究·····	陈铁健 (171)
胡适研究·····	耿云志 (224)
中国现代史的史科学概述·····	张宪文 (275)
中国国民党历史纲要·····	张同新 (321)
中国各民主党派的历史道路·····	曹健民 (349)
中国托派·····	唐宝林 (392)
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唐培吉 (428)
“文化大革命”错误发展的脉络·····	王年一 (458)
黄埔军校史略·····	李义彬 (507)
日本朝野研究“九一八”事变的动向·····	郎维成 (555)
关于中国国民性问题·····	姜义华 (580)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丁守和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举办现代史讲习班，要我来讲一次。主要向同志们介绍一些情况，同时也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首先说一下近代史和现代史怎么分？在史学界这个问题争论了好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一种意见认为，近代史应该从鸦片战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现代史应该从新中国成立后算起，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另一种意见认为，“五四”以前是近代史，“五四”以后是现代史。但是大家在习惯上，说到近代史就是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说到现代史就是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现代和当代究竟怎么区别也很难说，一般说解放后就是当代，在这之前就是现代。我们这个讲习班所讲的现代史、革命史，主要是讲“五四”以后到全国解放。

下面，我准备讲这几个问题：第一，中国近代史的指导线索问题；第二，关于资产阶级运动的问题，或者说对维新派、改良派的看法问题；第三，国民性的改造问题；第四，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问题；第五，关于人物评价问题。

一、关于近代史的指导线索问题

这个问题在史学界争论比较多，近几年尤其活跃，《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都发表了好几篇论文，《光明日报》也发表了文章。近代史的指导线索是什么？一般来说，认为是阶级斗争，这一点在争论中没有分歧。有一个刊物，叫《近代史动态》，它整理了一份关于近代史指导线索问题的材料，说现在近代史指导线索有两种：一种是学习外国；一种是坚持阶级斗争。下面是叙述：学习外国，哪个为代表；坚持阶级斗争，哪个为代表。这样整理材料是不对的。我曾经对他们说，学习外国为指导线索，谁也没有这样说过，这是第一。第二，对近代史来说，学习外国是对的，先进分子才学习外国。怎么能把学习外国与坚持阶级斗争对立起来？难道学习外国就是反对阶级斗争了？整理这个材料是不对的。大家都同意以阶级斗争为指导线索，但如何以阶级斗争为指导线索，就有分歧了。如50年代，比较多地主张以阶级斗争为标志，提出三个高潮，即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三次革命高潮。近几年来，有人提出近代史应分四个阶梯，即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认为太平天国打击了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洋务运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发展开始走了一步；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更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四个阶梯说，少了一个义和团，多了一个洋务运动，以戊戌变法补义和团。现在看来这两种意见比较尖锐，而这里面涉及到如何评价洋务运动，如

何评价义和团。有的人指出四个阶梯说抬高了资产阶级的作用，抬高了洋务运动的作用，而否定了农民战争的作用。另外的人说，我们没有否定农民战争，太平天国我们没否定，义和团也没否定。义和团主要是自发地反对洋教、反对八国联军的民族运动，它没有要求推翻封建势力，反而被清王朝所利用。洋务派客观上起了一些进步的作用，它要求学习西方，在国内也要求改变一些现状，搞些资本主义的东西。有的人说，洋务派搞的主要是军事工业，为了镇压人民。因此争论就比较多。

大概是在本世纪40年代前，对洋务派是比较肯定的，或者说肯定的比较多一些。到了40年代中叶后，因当时反对蒋介石，因此就提出曾国藩、袁世凯、蒋介石他们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卖国贼，范老（范文澜）曾写过汉奸卖国贼曾国藩，作为中国近代史的附录。那么从洋务运动本身，从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看，对它完全否定看来是不妥当的。洋务派是封建统治者的一部分，但在当时中国的情况下，搞些资本主义，民间不可能，因此中国资本主义的积累，或是民族资本主义的形成，其来源正象毛主席过去说过是地主、官僚、商人。后来有些人研究说还有买办，是买办、地主、官僚、商人转化的。因此，早期资本主义产生离开官府、统治阶级不太可能，而帝国主义不是要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而要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全面否定洋务运动是不合适的。我没有专门研究洋务运动，但看了一些东西，觉得对洋务运动应该具体分析。但是现在说法就不一样了。洋务派过去是指曾、左、李，加张之洞。对左宗棠现在又说他是爱国的；他镇压太平天国是错的，但他收复新疆

是立了大功的；他也请外国人，但外国人必须听他的，因而他是自主的。那么李鸿章是否完全卖国呢？在李鸿章的奏折、文牍中也有很多抵制外国的言论。左宗棠和李鸿章是有不同，矛盾很厉害，但他们都想搞近代企业，这恐怕是一致的，而且李鸿章搞的还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光肯定左宗棠而否定李鸿章，这也不一定合适。当然李鸿章干了很多卖国的勾当，《马关条约》、《辛丑条约》都是他签订的，大家一提起就憎恨他。但是他搞的企业还是有肯定之处的。去年在山东威海召开的甲午战争讨论会，也有同志提出，甲午战争中去日本议和，签《马关条约》，李鸿章并不愿意去，并认为谁去都一样，因你打了败仗也就没有办法。因此有些人对李鸿章好象有些鸣不平。《马关条约》是光绪帝派他去，让他签的，当然在李去前，光绪是流了眼泪的，李鸿章也不愿意去。这些事情都可以研究。洋务派搞的那些东西还是有用的，如李鸿章在上海设立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了那么多书，有科学技术发明的，也有些政治的书籍。洋务派在某些方面松驰了资本主义发展，在某些方面阻滞了资本主义发展，这要具体分析。对洋务运动不能无限拔高，但也不能完全否定，要具体分析。现在两种意见还在争论，赞成两个过程、三个高潮、几大事件，其中有些是老专家。现在提出不同意见的是较年轻的，50—60岁。这方面的问题可以争论，可以讨论，恐怕这不好算是精神污染。我觉得问题可以讨论，不要给人扣帽子，一说就讲这是反对阶级斗争观点，或者说是否定阶级斗争观点，或者说这四个阶梯的观点是企图突破毛主席“两个过程”的束缚。有的同志写文章就说人家是突破了这打了引号的话，实际是他自己受了这打了引号

的话的束缚。后来我找这个同志谈了我的意见，我说人家并没有突破“两个过程”，而是从两个过程里探讨资本主义发展、经济关系变化，从中国社会内部找出变化的原因来，这并不是否定阶级斗争，从经济上来讨论，是唯物史观嘛。

主要是上述两种意见，当然在两种意见里，对具体问题也存在分歧。另外有一种意见是从中华民族觉醒这个角度来找线索，探讨中国人民如何一步一步地觉醒起来。反映这种意见的，也有几篇文章。也有同志要写一本书，论中国近代民族的觉醒，想说明觉醒就是用资本主义的东西，用资产阶级的东西，如自由、平等、博爱，再进一步是用民主科学，再进一步就用马克思主义，想讲清中华民族如何一步一步地失败，一步一步地探索。线索问题很复杂，大家还在争论，我的意见是大家一起来具体地进行研究，而不要扣帽子。

这里还牵涉一个问题，因为是四个阶梯，有人就指出如果认为洋务派、改良派、革命派是一脉相承的，就会得出革命派来源于改良派、改良派来源于洋务派的结论。另外一些同志就说，我们没有说洋务派、改良派、革命派是一脉相承，是一个阶级。但在事实上改良派有很多人是从小洋务派里分化出来的，革命派中也有很多人是从改良派中分化出来的。这里有继承有扬弃，没有扬弃也就无所谓继承，这也是合理的。拿孙中山来说，开始也还是想依靠李鸿章，如说他不相信李鸿章，为什么要上李鸿章书呢？革命派还活动让李鸿章出来取清帝而代之嘛，在《中国日报》上都有记载嘛，他们派人与李鸿章、张之洞活动，希望他们来代替清政府。革命派与改良派有扬弃有继承，这

没有什么了不起。

与这个问题有关的还有近代史的开端。本来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开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也有的同志提出，如说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从鸦片战争开始，那么鸦片战争是革什么命？它固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英国的，但能说它是民主革命吗？它反帝是由清政府来反的，林则徐就是清政府派去的封疆大吏。太平天国是农民战争嘛，中法战争、中日战争这些能算民主主义革命吗？因此这些同志提出，中国真正的民主主义运动，或者说资产阶级运动，是从资产阶级的活动开始的，具体来说应该从戊戌变法开始。因此旧民主主义革命也应从这地方开始，这是一种意见。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鸦片战争只是对沿海若干城市有影响，对广大内地没有影响，因此认为从鸦片战争开始也不好。苏联说，你们的近代史应该从清朝入关开始。所以，对近代史的开端，也有不同意见。我觉得近代史还是从鸦片战争开始讲为宜，史学界一般也这样认为。当然鸦片战争首先对沿海城市有影响，但对整个中国社会，对清政府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所谓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只能说是这种革命的一个起点，只能说它属于这个革命的范畴。我们说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五四运动开始，也有些同志不同意，说五四运动没有反帝，只反对日本，没有反对美国，也没有反对封建，也没有依靠人民大众。实际上，那也只是指它属于这一个革命的范畴。从中国社会的变化，从对思想上的震动这方面看，近代史应该从鸦片战争开始。

二、关于资产阶级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出现了资产阶级运动。中国的资产阶级运动一开始就分为两支，一支叫做维新运动，一支叫做革命运动。当然维新运动要多一点，但革命运动，象孙中山的活动也很多。在维新运动高潮过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搞维新运动的那些人还在活动，而且影响还很大。这两支运动一直到20年代实际上还存在着。维新运动是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它是主张革新的，而不是主张守旧的。革命运动也是很清楚的。整个说来，两个运动都是资产阶级运动。过去我们在近代史研究中，如在延安时期，对维新运动评价是很高的，以后逐步贬低，到解放后对戊戌维新、对改良派基本上持否定态度，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我觉得对戊戌变法、对维新运动应该整个地加以研究，特别是在思想范围内，维新运动在当时震撼了整个中国。维新运动作为一个政治运动，到戊戌政变失败了，但作为思想运动它更深入了。当然在戊戌变法时期《时务报》等也是很振奋人心的，但是他们宣传资产阶级思想，更大量的应该说是戊戌变法以后。戊戌变法时期《时务报》、《国闻报》对社会影响很大，但真正从思想内容来看，这些报纸就比不上梁启超后来创办的《新民丛报》，甚至也比不上《清议报》。对西方政治学说的介绍，更主要的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在这之前，他们也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如严复，他宣传了进化论的思想，译述了《天演论》。但是更大量的宣传是在戊戌变法以后，表现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清议报》、

特别是《新民丛报》的创办。所以作为维新思想、变法思想，作为改革的思想，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宣传，主要是在20世纪初期。如革命派于1903年出现，到1905年以后出现了活动高潮。那个时候，改良派（或者叫立宪派）也还在进行活动，而且也不断地深入宣传。因此对这两支，我觉得都应该肯定。对革命派一直是赞扬的，而且是越评价越高了，而对立宪派则相反。1981年在武汉召开辛亥革命史讨论会，有的同志提出来，说保路运动就是革命。现在一般的说法是，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先声。其实，保路运动就是立宪派搞的嘛。现在有些同志提出对立宪派也应该有全面的估计。过去我们对革命派就是褒，对维新派，尤其是改良派、立宪派就是贬，这样恐怕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

革命派，改良派或者叫维新派、革新派，他们是两支队伍，在近代中国的现实政治中，在中国的思想潮流中，他们是有所同，有所不同的。在国体问题上，都是主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没有本质区别。国体问题是哪个阶级在国家中占什么地位的问题。在国体问题上，资产阶级维新派、改良派、立宪派他们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而革命派、孙中山也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并都主张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或者说占统治地位。这点从本质上说，没什么不同。改良派，如康、梁，他们的报刊所宣传的实际上也是建立资本主义国家，当然他们对封建势力作了妥协；那么革命派当时也主张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对封建势力是否就反得那么彻底呢？恐怕也是妥协的，而且在思想方面甚至妥协得更厉害。那时，梁启超他们宣传资本主义更多一些，而孙中山提出要

继承中国的道德嘛，继承中国的传统思想嘛。当然改良派也提倡“托古改制”。因此在国体问题上，他们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政体问题上他们有不同。维新派、改良派、立宪派他们主张君主立宪，革命派他们主张民主共和。但是君主立宪、民主共和都还是资产阶级国家，双方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在政体问题上。那么民主共和、君主立宪究竟哪个好？恐怕很难说。这在外国都有先例。法国是搞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是搞民主共和。至于美国，它在反对了英国以后，也是搞了民主共和。相比起来日本是君主立宪，是搞改良、改革，但它在日本是搞通了的，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英国也是君主立宪。当然，那时候很多人坚持学法国，学法兰西革命，特别是革命派。但是他们也学习日本。那时梁启超主张学习日本，以日本为榜样，以英国为榜样，但他也注意到了学法国。所以说，在世界上，这两种体制都实现了资本主义化。那么在中国的条件下究竟是哪个合适？历史证明哪个也不合适。有人说，改良主义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在中国走资产阶级共和的道路，此路也不通。

我们总是讲革命很好，改良总是不好，因此否定改良。其实，改良跟马克思、列宁说的在工人运动当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当中出现的那个改良主义，不是一码事。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他们批判过改良主义，这是完全对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还讲过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那么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有那么大的封建势力，究竟怎么变革？结果搞了两支运动，但这两支都没有成功。革命派应予肯定，维新派、立宪派也起过一定的作用，我

觉得不能否定，要具体分析。一个要把清政府推倒，一个要改变清政府，似都无可非议。

对待帝国主义的认识，我看两者也差不多，他们都看到了外国的侵略。改良派、维新派、立宪派在他们的刊物中都讲到民族危机、民族危亡；革命派也讲到民族危机、民族危亡。但是谁都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而相反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幻想更多些。因为帝国主义就是资产阶级国家，而革命派认为我们现在要实现资产阶级国家，实现了，将来我们都一样，因此他们还会援助我们。他们抱有这种幻想，这当然是错误的。总之，他们都只是从感性上认识到了民族危机，但都没有认识帝国主义。

对封建主义，他们也都认识不清。但是，如果看一看他们的文章，看一看他们宣传的东西，那么应该说对封建主义、封建制度的揭露，维新派、改良派、立宪派的刊物比革命派的揭露要深刻，这一点，只要把《新民丛报》和《民报》比一比就可以知道了。改良派认为，中国为什么落后，是由于两千年来封建专制统治的结果。而革命派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有两百年来的专制统治。所谓两百年来的专制统治，很明显是指满族入关以来的异族统治。有的同志说，讲两百年就是为了否定两千年。当然也包含这个意思，但是仔细看来，主要是把满族统治看作是异族的压迫。当然在革命派中也有讲到两千年的，但却是少数。而在改良派、维新派、立宪派看来，如梁启超他们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不在于清朝皇帝，而在于社会制度。因此，他们要求改变封建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实行议会制。而革命派认为造成中国落后的罪恶全在清朝皇帝，只有把他打倒，才能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可见真正

从思想上深入宣传反封建的是梁启超他们。

对于资产阶级思想也有不同的认识，梁启超宣传的着重是“自由”，孙中山宣传的是偏重“平等”、“博爱”。这大概与他们对资产阶级的不同阶层所提出的不同要求反映不同有关。由于孙中山更多地看到了下边的阶级矛盾、贫富悬殊，因此他特别注意“平等”。梁启超更强调“自由”，是因为他更多地接触到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特别是19世纪英国所宣传的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知道“自由”是要靠竞争的，不能搞平均。他们都宣传资产阶级思想，但宣传的内容有所同，有所不同，或者侧重面不同。

因此改良派和革命派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有所不同，有所不同。在某些方面，如对封建主义的抨击，梁启超他们超过《民报》。但是在《民报》和《新民丛报》的论战中，《新民丛报》失败了。本来《新民丛报》对资产阶级思想介绍最多，它为什么会失败呢？原因就在于它在保存不保存清朝皇帝的问题上提出了脱离实际的主张。由于现实生活摆在那里，清政府是腐败的，不仅使封建专制更加重了，而且还有满族的特权，因此在广大爱国者的心目中，只有把它打倒。另外，由于满族是异族，革命派带有“排满”的色彩，故颇受汉族人支持。现在有些人想否定“排满”，我觉得否定“排满”对辛亥革命的有些问题是讲不清楚的。

在对待农民问题上，改良派敌视农民，革命派脱离农民，结果都失败了。后来孙中山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耕者有其田”，那是后来的事。在当时，中国的土地问题，封建阶级的基础问题，谁也没有解

决。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因此，我觉得对革命派、改良派要进行具体分析，不要一概肯定，一概否定，要分析在哪些问题上他们是对的，哪些问题是错误的。

再比方说保路运动，那个时候是为了反对把铁路让给外国修建，故称为保路运动。但实际上无论是革命派、改良派或是立宪派，他们都主张中国向外国借资，来发展中国的企业，这点是一致的。孙中山、梁启超是这样，国内的立宪派，包括张謇他们也是这样。但恰恰在修建铁路借外资，是中国修还是外国修问题上，出现了保路运动。这是为什么？我觉得把这些问题提出来研究都是很好的，确实值得讨论。很多是矛盾的现象，我们如何通过具体分析，理出脉络来。一般认为，在辛亥革命前，主张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主张批判封建专制制度，主张反对列强也是进步的。但他们到底是怎样看的，实际上又是怎么做的，这都要具体分析。孙中山把清朝推翻了，似乎民族主义就没有了，只有二民主义了。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但实际上没有反帝，反封建也主要是“排满”。因此，他的反帝反封建，集中在“排满”。而改良派呢，要保留皇帝。所以我觉得不管从政治、经济、思想，以及实际斗争来看，对他们所提出的一些口号、纲领，我们都要具体研究才能更好地解释它们。

三、关于“国民性改造”的问题

“国民性改造”很早就提出来了，但最被人们注意的

是在 20 世纪初到 20 年代。“国民性改造”最本质的就是伦理问题。当然，我们一般地说，中国人民是吃苦耐劳的，是勇敢的，是热爱和平的，从古代以来就是这样认为，这点大概没有人否定。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是愚昧的，是落后的，是无知的，是有阿 Q 精神的。“国民”这个面很大。20 世纪初的人们认为，所谓“国民性”，主要的是讲能力。那时人们是用愚昧、落后、无知、奴隶的性格，甚至用奴才的性格来表述中国的“国民性”的。至于中国为什么总是挨打，他们认为就是因为中国人太无知了，太无能了，太无用了。这种看法显然有片面性，或者说是唯心的看法，因为中国人民又是爱好和平的，特别是吃苦耐劳这一点，在世界上是不可比拟的。但就他们讲的问题本身来说，是不是存在？我觉得是存在的，而且还很严重。关于这个问题在 50—60 年代的时候，也有些同志曾提到过，但受到了批判，说这是唯心论，忽视劳动人民的历史作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诬辱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当时所作的这么个结论，甚至反映到了《鲁迅全集》的注释里面。因为鲁迅是伟大的旗手、民族的英雄，不好说他别的。但由于他在自己的文章里面讲了很多国民性问题，因此在注释里面说，那时他还没有接受唯物史观。很明显，这样的注释在看法上有片面性、有失偏颇。新的版本改了没有，我没有注意看。

这几年有的同志又开始重新研究这个问题，我也想得很多。过去人们对“国民性”讲的有片面性，但就问题本身来说确实存在。早期的先进分子看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对的。因此在中国，是资产阶级或接受资产阶级思想的